

琦君散文选

林薇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琦君 散文 远



林薇 编



淮阴师院图书馆 675956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琦君散文选/林薇编.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2031-2

I . 琦… II . 林…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2796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定价：14.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选收旅美台湾女作家琦君散文作品共 41 篇。

琦君的散文以怀乡忆旧独树一帜。她把对故乡、亲人的缕缕情思凝于笔端，感情浓烈真挚，文风质朴平实，笔调清丽雅洁，于平淡中见深沉。

琦君散文选

三更有梦，情系故园

——《琦君散文选》序

林 薇

琦君，女，原名潘希真，浙江省永嘉县瞿溪乡人，是当代台湾散文家中的翘楚。

琦君自 1949 年 6 月在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发表处女作《金盒子》开始，迄今笔耕不辍。陆续出版 40 多部作品集，主要散文集有：《琴心》（小说散文合集，1954），《烟愁》（1963），《红纱灯》（1969），《桂花雨》（1974），《三更有梦书当枕》（1975），《母心似天空》（1982），《水是故乡甜》（1984），《此处有仙桃》（1985），《琦君寄小读者》（1985），《泪珠与珍珠》（1989），《母心佛心》（1990），《妈妈银行》（1992）等 33 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了她的散文自选集《翡翠的心》；同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也出版了散文选集《泪珠与珍珠》。在台湾，她的不少散文集获过不同形式的文学奖。

琦君出版处女作《琴心》时，已近不惑之年。她是在已有相当人生阅历和文学修养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的。作为一

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在 4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有其一贯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创建了一方独特的散文园林。

琦君的文学生涯

1917 年 7 月 24 日，琦君出生于浙江永嘉。其祖父身为翰林，父亲潘国纲（字鉴宗）陆军大学毕业后，曾留学日本，后为浙江督军卢永祥的部下。身为将门世家，童年时代“官家大小姐”生活，并没有给琦君带来快乐。她自幼缺乏父爱，在母亲泪眼中成长，又目睹父亲新娶姨娘之后，姨娘的得宠与跋扈，母亲的落寞与凄楚，亲密伙伴——小哥哥之死别，使她过早地领略了忧愁滋味。童年生活的唯一慰藉，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村生活，是相依为命的母亲所给予的慈爱教育；还有像活神仙一样快活的外公，乐天坚忍而又仁慈的乞丐头——三划阿王，幽默风趣的阿荣伯伯等对她的慈爱管教。这一切都成了滋养琦君文学创作的“土地”，她时常梦见亲友和故乡，以一支色彩斑斓之笔抒写童年之梦痕。

五岁起，琦君开始随家庭教师识字读书，接受严格的国学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1930 年，琦君报考杭州弘道女中，英文、算术都不及格，因她是考生中唯一能以流利的文言文应试而被入选。16 岁那年，她获得初中部作文比赛第一名，被同学封为“国文大将”。读高中时，她写了《我的朋友阿黄》一文，投稿《浙江青年》，被刊出，首次尝到了发表作品的快乐，也埋下了她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因子。

1936 年，琦君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在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里，琦君读了不少西洋名著，她尤其偏爱《简·

爱》、《小妇人》、《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类自传性小说。

琦君虽进洋学堂，仍主修国文专业。当时系里学生少，师生感情笃深，系主任夏承焘教授又是浙东大词人，对学生的古文根基要求甚严。“一首词要你改上十几遍，一字不妥，定要你自己再去寻求那唯一贴切的字眼”^①。夏老师谆谆教导学生“与其以脑作诗，宁愿以心作诗”^②，切忌爱赋新词强说愁。他说华丽的词藻固然可以装饰文章的外表，若没有“真善美”的内容，读起来骨多肉少。这种“素面相见”的文学理论，使从小作文爱洋洋洒洒掉书袋的琦君茅塞顿开，找到新的写作之路。

逍遥的女大学生生活犹如昙花一现，1937年抗战爆发，琦君曾辍学归家。曾经显赫一时的潘家大宅，也因父母亡故，战乱的流离而败落，旧日繁华成一梦。

琦君于1949年5月抵台，经故友推荐，进入高等法院做事。

来台不久，生活一安定，思乡的愁绪爬满琦君那颗温柔多皱的心，“像树木花草似的，谁能没有一个根呢？”^①，她渴望以壮健之身回故乡，“我要与梦寐中曾几度相见的人们，真正的紧握着手，畅叙别绪离情”^②。这一股难以遏止的乡愁撩起她的创作欲望。1949年6月，她的处女作《金盒子》、《飘零一身》发表了，从此走上创作之路，《烟愁》、《红纱灯》、《三更有梦书当枕》……一本接一本的散文集，陆陆续续地问世了。

^{① ②} 《琦君自选集·写作回顾》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75年版。

她的作品让人感受到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宽厚与古典风范的高雅、隽永，这恰是现代工商化社会渐渐流失的美质，从而更引起人们的珍惜和眷恋。

1983年，琦君随夫调差赴美定居。海外生活还使琦君领略不少异国风情和异国文化，从而拓宽她的写作路子，使她的文风由昔日的浅愁，转向幽默和老成，带有智者的风趣与豁达、学者的哲理与顿悟，呈现委婉多姿的景观。

1990年与1992年，琦君两次回大陆，踏上了这一片魂牵梦萦的土地，写下了《万水千山师友情》等。

如梦如烟的情感世界

琦君在其40年的创作生涯中，构筑了一个怎样的情感世界？这个世界留下了童年的梦痕，浮现着亲友的面影，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渗透着现实的况味，映现了异国的风情，有歌哭也有戏谑，无不饱含着一位游子“剪不断、理还乱”的离愁别绪、“水是故乡甜”的乡思爱心和时刻关爱人生的宽厚情怀。

童年之梦痕 童年生活是琦君散文取材的重点之一。透过《三更有梦书当枕》、《琦君说童年》、《灯景旧情怀》这些富有诗意的书名和集子，以及她的散文化、自传体小说《桔子红了》，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总是左顾右盼着“过去”的精灵在游荡，一个魂牵梦萦、记忆鲜活的童年。

透过她这一组“小春自叙”，隔着岁月的晨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孱弱胆小、自卑倔强、敏感多愁的小女孩。她父亲是武官，幼年给她的印象是“巍峨、英俊、严肃而冷酷。他很少和妈妈说话，更少伸手抚摸一下哥哥和我”（《小

玩意》)。母亲的被弃,小哥哥的夭折,在她童年记忆中烙上沉重的灰影。她成了一位不幸福的“大家闺秀”。

琦君30来岁步入文坛,开始用散文抒写童年记忆,竟一发不可收地写了40年,而今年近古稀,仍以惊人的记忆和不断更新的视角写她特有的取之不竭的童年生活。

这一份“童年情结”源于她不幸的童年经历。她说:“我的童年并不快乐,好像是悲伤的情形总是容易记得,快乐的事情容易忘记。我常常想到母亲的不快乐,父亲的不快乐,以及自己的不快乐,童年很多往事都牵引而出”^①。从心理学上说,儿童时代是人的性格形成的初始阶段,儿童心理最为稚嫩、纯真、敏感和直观。孩提时代的种种经历和体验,有的随年事增长而自然流失了,有的则沉淀于心灵深处,经过岁月的淘洗和酿造而变得更为醇厚和深刻,成为耐人寻味的一种人生经验。对琦君而言,她童年的柔嫩心灵更多地受到压抑和伤害,过早地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也就更多地烙上郁郁寡欢、善感工愁的印痕。到了中老年时代,她漂泊异乡,思念故土,进一步体认“失乐园”的凄苦悲伤。她笔下的童年并没有成年眼光的“透视”,“只是回到儿时的心情,实实在在地写出当时的情景”,但因事过境迁,回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哪怕当年哭过,如今提起还会哭,也是快乐而温暖的”^②。因此,她的“童年”梦痕既有人生回味的感悟,又有眷恋故土的乡愁,抚今追昔,情真意长。

母心似天空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琦君回忆

① 陈芳容:《那颗歌唱的心灵》见《琦君的世界》台湾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琦君:《细雨灯花落·从前》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年版。

童年生活，感念最深，着笔墨最多的人物是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母心似天空》、《母心·佛心》和《妈妈银行》，都是为纪念母亲而写的。

琦君抒写母亲，一方面是抒发思母愁绪，而这一份愁绪又与寓居台湾跟成年儿子无法交谈的“代沟”之痛，和漂泊异国的游子情怀相牵连而漫衍，流成一条“愁”的长河。另一方面，同时还隐含着飘泊在外的游子对乡土故人的追寻，对中国传统人伦亲情的认同和赞颂，表达中国人的亲情观、伦理观。

琦君笔下的母亲是中国慈母形象，不仅具备一切旧式女子勤劳、质朴、默默奉献、忍辱负重的美德，也承受一切旧式女子的悲苦。这位母亲，与冰心笔下的母亲有同有异，同属于贤妻良母型，都温柔、博爱，只是忍辱负重，含辛茹苦，更具普遍性；却不同于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折磨自己也折磨他人，甚至以吞食自己儿女的生命与幸福作为自身痛苦的补偿，对社会充满敌视与仇恨，从而走向“恶”。琦君的母亲始终是“善”和“忍”的化身，更具宗教意味。

母亲的“善”，表现在宽厚待人的胸怀和佛家的慈悲心肠。不论是家里佣人，还是乡里穷人，叔伯妯娌，她都相处得融融洽洽。家里佣人阿芳偷蛋，母亲不许声张，她说：“别人的秘密事越少知道越好，万一无意知道了，也要包涵”（《秘密》）。她慷慨大方，乐善好施，帮助穷人总是“和颜悦色，喜溢眉梢”。她爱小动物，不忍杀生，常见她“跪在佛堂里念大悲咒，往生咒”，大家都说母亲是“菩萨心肠”（《母亲》）。不仅如此，她在父亲亡故之后，不与姨娘记仇，反倒同情姨娘，与她相依为命（《髻》）。

母亲的“忍”，突出表现在她对丈夫纳妾的态度上。母亲忽然沉默寡言，满眼泪光，将自己打扮成乡下老太太（《髻》），尤其是父亲带姨娘上“最最贵的西餐”享乐去，母亲却在后廊檐下，就着微弱的光线，为父亲夜晚“进补”而忙碌（《吃大菜》）。母亲“无怨无艾地容忍着他半生的冷落”，仍一直爱着他（《母亲新婚时》）。琦君既显示母亲内心的悲苦，又表现母亲的痴情，客观上也揭示了旧式女子无法自立、忍辱负重的悲剧命运。

总而言之，在琦君笔下，她是位识字不多，却通情达理、虔诚信佛、恪守“妇德”的典型的贤妻良母。她没有什么“大道理”，却以躬亲履践，言传身教，为爱女树立了一个可以依循的规范。

师恩如春风 除了母亲，夏老师是琦君怀乡思亲散文中最常忆念的亲人。如前所述，琦君童年缺乏父爱，潜意识中她将父爱移植于夏先生，在他身上寻求父爱的补偿。夏先生一口字正腔圆的永嘉官话，和“父亲说的正是同样的‘官话’”，这无疑是对琦君亡父之痛的一个心灵上的抚慰，使她不由地将父亲生死与荷花有缘同夏老师爱荷、画荷联想成一片，记忆中故乡的荷花瓣上，“显现父亲和夏老师的音容笑貌”（《想念荷花》），令她思绪万千。琦君曾对笔者坦率地说：“的确，我是把夏老师当作自己的父亲来爱的，他影响了我的一生”。因此，琦君记叙师友情的散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怀人愁绪的抒写，而且隐含着她对传统师生情的赞美，并将此视为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理想典范，一再加以推崇。

琦君十分感念夏老师对她的文学启蒙。首先，夏老师教

她“乐读”，读书“要去除‘得失之心’的障碍，随心浏览，当以欣赏之心而不必以研究之心去读”（《三更有梦书当枕》），读到会心之处，书中人自会伸手与你相握，夏老师还于历代名家诗文中不惮烦琐，深入浅出地讲解精华所在，让琦君领悟如何读书。其次，夏老师教导她作词、作文、作人的关键在于至诚，至诚才可顺乎自然而矫情，并以他的诗“松间细语风吹去，明日寻来尽是诗”，诱导她感知万物的情趣，自然的奥秘（《留予他年说梦痕》），他说写文章不仅要炼字炼句，更要炼意，要炼到人人意中有，人人笔下无，还须避免平庸的感伤，而要有超凡出俗的崇高感（《吾师》），夏先生的这些教诲，令琦君一生体味，受用无穷。琦君牢记恩师的赠词：“留予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人生是短暂而美丽的，只要以温存宽厚的心去细细体会，一花一木都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情趣，即便是痛苦与烦恼，怀着童心和爱心，过后也会化作满带温馨的残梦。琦君的那颗“温厚的爱心”就是由此而萌发、发展的，并以温柔敦厚的胸怀，见人生人情，见物生物情，写下了许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优美篇章。

乡情浓于血 “欲扶支梦到江南，可能梦似人间久”（《踏莎行》）。琦君十分依恋她的童年故乡。她说：“我们从大陆移植来此，忽忽将三十年。生活上尽管早已能适应，而心灵上又何尝能一日忘情于故乡故土的一事一物”，“莼菜鲈鱼长入梦，他乡虽好总添愁”（《家乡味》）。这份“乡愁”，因有家归不得和台湾社会日益工商化而更为沉重浓烈，难以排解。诚如余光中所言，当代台湾乡愁文学由于双重的“隔绝”而长盛不衰，“一方面是个人与社会的隔绝，另一方面是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与中国的泥土以及日渐消失的农业社

会的阻隔”。^① 琦君的“乡愁”也是双向的。她说：“每思大陆的故乡，邈远不可接，而台湾则是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第二故乡。如今又客居异国，我不免于怅触中，写下了《水是故乡甜》一文，即以为本书的书名，既可以涵盖全书的怀旧之旨，亦借以寄我万里归心”（《写在（水是故乡甜）之前》）。琦君的这段自白道出了她乡愁散文的总主题，实际上也是台湾一切乡愁散文的总主题。

琦君“乡愁”散文的特色在于：她不刻意描绘家乡的风光，却着意描绘家乡的风俗礼仪和奇人轶事，再现江南的风土人情。她笔下的乡土生活富有田园诗情趣和民俗色彩，保存了农业社会古朴的民风和淳厚的人情。不论是忙碌还是悠闲时光，人们都哼着小调，带着笑容，“他们从来没有和时间赛过跑，可是从日出到日落，他们都在工作中，他们也都在游息中”（《浮光半日闲》）。而每年的初二拜年，阿荣伯伯提着满篮用“红纸包”——内有红枣、莲子、桂圆、松糖等，“每包至多不会超过银元四角。每家放一个，是一种象征性的礼物，惠而不费”，而乡邻们回赠的礼物也是一大篮满载而归（《春节忆儿时》）。由是观之，琦君以饱蘸深情之笔描述记忆中“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的悠悠农村社会，那“绝不是浪漫气息，而是走向‘忘忧’‘忘我’之境”，借以寄托自己对“精神家园”的追求（《浮光半日闲》）。

她笔下的乡间“畸人”，着意突出各人的“怪癖”，颇有俗文化色彩。童年时代的启蒙师，“两排黄牙自出生以来从不洗刷”，一年四季都只穿一件蓝布大褂，“书房因此总冒着一

^① 余光中：《中国现代文学大系·总序》台湾巨人出版社 1972 年版。

股汗酸气味”(《启蒙师》),“童仙伯伯”怀才不遇,爱睡觉也爱看书,“看着看着就躺在靠椅子呼呼大睡”,他写得一手好祭文,画得一手“才子画,书生画”(《童仙伯伯》);老长工阿荣伯伯,幽默风趣、好赌,识字不多却能“拿起什么破毛笔就能画”,不但“画得栩栩如生”,还讲得头头是道,仿佛是“历史通”(《阿荣伯伯》)。

这些浙东习俗与畸人轶事,如同鲁迅小说中乡土风俗的描写一样,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反光镜,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民俗研究价值。它构成琦君散文世界很有光彩的乡土风俗画,以淳朴自然、栩栩如生而引人注目,它同时也寄寓着琦君对故土的一片痴情,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追寻,又隐含着她对现实社会变迁的困惑和惋叹。

现实的况味 琦君抒写台湾生活与旅美生活,以及她的读书札记等篇章,与怀旧散文有别,呈现出智者的风趣与调侃,学者的深邃与豁达,先前的那种浅愁已化为含笑的玩味。

对于现实处境和人际关系的变化,琦君特别敏感,并有独到的感悟。在《我家龙子》中,她体验到“代沟”之痛;在《浮光半日闲》、《爱与孤独》等篇中,她从日常琐事中发现当代人忙于谋生,人情淡薄,连夫妻、朋友都顾不上情感交流,这一切都令琦君格外思念母亲生前关怀他人的热诚与善良,遥念悠闲而人情味十足的农村社会。

面对工商化社会的种种“隔膜”,琦君以“今之古人”自居、自傲。一方面,“今之古人”洞见现代文明之利弊。她承认“电脑打字”的工整与快速,但发觉它呆板单调,哪有龙飞凤舞的手写体给人一种“如晤”的亲切感?(《电脑与人脑》)

一切的家务拒绝以机器代劳，颇感“身为形役”之苦，却“自认为颇有心得，倒可以借此重温一下旧日生活”（《再做“闲”妻》）。另一方面，在方寸灵台之间，自辟一片“传统”田园，以微笑面对都市的烦恼。她总是童心不泯，爱购贱卖的小玩意，喜欢独自“寂寞地摸摸弄弄，和小爱宠说说话，痴痴傻傻地，却也自得其乐”，保持昔日乡村那份闲情（《童稚的情趣》）。她沉迷于自己简陋的书房，“使我有遗世独立之感”，很有一种排除忧患，知足常乐的愉悦（《自己的书房》）。她还以中国人传统的眼光去审视和品评现实生活与异国风情，时而找寻中西文化的契合点并予以认同，认为美国老人“进养老院等待上帝的召唤”，与“中国信佛的老人们进庵堂静养”，都是一种达观的想法，子女手持鲜花在节日或生日前往探望，也是尽孝，洋溢着一种亲情的温馨（《美国人的亲情》）。

综上所述，这一方“如梦如烟”情感世界，展示的是一个被记忆缠绕的天地，即便是现实的品味也渗透着怀旧的意蕴。一方面，琦君摸索着记忆长河而唱出了一支温情的恋歌。她以牧歌的情调勾勒出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情，在充满谦和、宽容、亲热、关爱的人际关系中，洋溢着中华民族古朴厚道的伦理精神，从而开掘出理想和谐的乡土境界。另一方面，她也面对现实世界，透过光怪陆离的表象而洞见现代人的生活真相，并将所有的热情与精力都投入替“传统”在现实人生中找寻“生存”与“出路”，渴求以“传统”来补救现实的缺憾，化戾气为祥和，抱有淑世心怀。当然，她的善良好愿并不切合实际，她的价值取向与时尚背道而驰，这就决定了她的乡土恋歌必然带有挽歌基调，笼罩着伤逝梦寻的气息。

氛。

“烟愁”之美学风貌

琦君偏爱“烟愁”一词所暗示的美学境界，觉得“淡淡的哀愁，像轻烟似的，萦绕着，也散开了。那不象征虚无缥缈，更不象征幻灭，却给我一种踏踏实实的，永恒的美的感受”^①。她的散文就刻意营造一个“烟愁”世界，呈现出淡雅、婉约、温柔、娴静的美学风韵。从美学意义上说，“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②。这就是说“风格”的形成与个性气质和题材旨趣密切相关，是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相契合的产物。因此，考察琦君散文的“烟愁”风貌，必须进一步探讨她的情感特征和艺术个性。

如烟的浅愁 所谓“烟愁”首先指的是“淡淡的哀愁”，即浅愁。琦君散文善感工愁，却很少涉及强烈激扬的情感领域，大多抒写思乡怀旧、伤逝感时的缕缕情愫。她从事散文创作之际，已度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少阶段，也尝过丧母的巨痛，流亡的苦楚，对人生的甜酸苦辣已有深切的体验，已能“化痛苦为信念，转烦恼为菩提”，以一颗温存的心来体味“生涯中的一花一木，一喜一悲”^③。她“深感这个世界的暴戾已经够多”，认为应通过文学“多多渲染祥和美

① 琦君：《留予他年说梦痕》。台湾洪范书店1980年版。

② 威克纳格：《诗学·修辞学·风格论》载《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③ 琦君：《三更有梦书当枕》。台湾尔雅出版社1975年版。

丽的一面，以作弥补”^①，“即便描绘惨剧与黑暗面到了入木三分，其用心应当为唤起人类的同情心，爱心”^②。因此，她的种种愁绪，正如杨牧所说的，“永远是无害的浅愁，不是伤人的哀叹”^③，恰似“无边丝雨细如愁”，既撩人心肠又慰情怡性。

其次，“烟愁”指的是轻烟似的飘忽、朦胧而又实在、透明的一种情绪氛围和意象世界。诚如白先勇所说：“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阅一本旧相簿，一张张泛了黄的相片都承载着如许沉重的记忆与怀念，时间是这个世纪的前半段，地点是作者魂牵梦萦的江南。琦君在为逝去的一个时代造像，那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诉说基调相同的古老故事：温馨中透着幽幽的怆痛”^④ 也就是说，琦君散文的情境并非海市蜃楼，而有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它是作者对失落的昔日生活的追寻和复活，存在于她的记忆之中。“那时的人情是多么温暖，天地是多么辽阔，时间是多么富裕啊”，漫步田埂，“一路都有人笑眯眯地喊我的乳名”，“父亲策杖散步在亭亭的麦浪中”，与荷锄的农夫聊上半天，或者“坐在书堆里，翻翻这本，摸摸那本，嘴里哼着比昆腔还特别的调子，就可以耗上一整天”（《浮光半日闲》）。但这只是一种可以感觉、追忆，却无法触摸的“实在”，是经过梦忆加工而成的田园生活图景，代表着一种精神上的寻觅和向往。她借此抚慰思乡之情，寄托理想追求，并坚信这种追寻有其积极意义和人生价

① 琦君：《钱塘江畔·细说从头》。台湾尔雅出版社1980年版。

② 琦君：《悲剧与惨剧》载《泪珠与珍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③ 杨牧：《留予他年说梦痕·序》。台湾洪范书店1980年版。

④ 白先勇：《弃妇吟》载《桔子红了》P2 台湾洪范书店1991年版。